



何言宏 / 著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介入与超越



我以为我们文学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价值观上的种种局限。
作为一种价值实践的文学实践，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仍然存在着种种迷误，
需要我们深入地清理与反省。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4042062

I267.1
1693

介入与超越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王平题



I267.1
1693



北航

C1731179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介入与超越 / 何言宏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 · 名家文存)

ISBN 978-7-5068-3947-1

I . ①介… II . ①何…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246 号

介入与超越

何言宏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刘文利 刘 娜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47-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

- 002 乏力的介入
- 010 繁盛时代的精神衰变
- 017 艰难的“当代史叙述”
- 024 文化制约着写作
- 030 异邦的荣耀与尴尬
- 035 “拿来”的必要与急切
- 040 适者生存的文学时代?
- 045 乡土中国的再度书写
- 053 多元博弈的文学评奖
- 059 复杂的代际张力

台湾诗人十二家

- 068 “包容那幽渺的与广大的……”
- 071 “当日光隐入层云……”
- 074 “隐匿的王后”，或“以暴制暴”的写作
- 077 “诗是一种对抗生活的方式”
- 080 “在沉默的佛陀面前……”
- 083 “嬉闹着荒腔走板的岁月”

主持的事情

086 “用着喑哑的嗽声呼喊土地”

089 “那些缤纷起落的卑微梦想……”

092 “她方”造访之时……

096 “诗人讲坛”主持人的话

123 “诗歌观察”主持人的话

131 “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讨论的主持人话

读诗

146 形同一场辽阔的苦役，或者……

154 ……但足以自成一个国度

164 “堪称典范的严肃”

167 诗歌正在悄然复兴！

170 怎样认识诗歌现实？

174 介入与超越

178 纯粹的抒情

183 彼岸札记

190 当代中国十大诗人（一九七九—二〇〇九）：
一个人的排行榜

读其他

- 198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启蒙
204 生的执著与热情
208 精神自传的自觉
216 怎样看待“文革文学”？
219 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暴力
226 “生死场”中的话语关切
232 文化江南的历史追怀
235 现时代的“阳羨茗壺系”
238 拓展我们美的经验
240 寻求一种可靠的伦理
246 七〇以后读札
261 作为精神资源的阅读
264 长篇小说三十年（一九七九—二〇〇九）：
一个人的排行榜

谈话录

- 270 “回忆和话语之乡”
285 从最无诗意的现实中寻找诗意
302 重新回到文学的根本
318 现代性视野中的藏地世界

①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一

①二〇一一年，应《上海文学》甫跃辉约，为该刊“批评家俱乐部”栏目连续主持十期题为“新世纪文学反思录”的系列对话，邀请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共同反思和总结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所论问题，至今仍很重要，兹将本人所谈的部分收入本书。

乏力的介入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一^①

至二〇一〇年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走过了十个年头，对这十年的文学，文学界与学术界都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做过很多总结，很多刊物都开辟栏目，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会议也都以此为主题。《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曾经在文学界广有影响，想邀请一些朋友以系列对话的方式，以“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为题，较为系统地反思新世纪文学，这无疑是非常及时的。我们初步提出了一些问题，涉及这十年文学的很多方面。栏目以一年的时间、十二期的规模和众多朋友的参与，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回顾、总结与反思，一定会很深刻，也会很丰富。这里我们先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做一番讨论，对于我们的文学来说，这个问题最为迫切。

^① 参加本期讨论的另有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

社会转型与文学的合法性危机

继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以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持续发生着相当剧烈的社会转型。这样的转型，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的基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各就其位，处于各个不同的社会地位，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痛苦、焦虑、欢乐与希望，形成了区隔明显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边界清晰，流动困难，在近于固化的阶层内部自我认同，不断地进行着各自阶层的再生产工作。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文学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群体，就处身于这样的转型之中，对它们的考察，显然应该注意这样的事实，注意到形形色色的文学实践如何理解和处理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天在常熟的会上，清华已经谈到了他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我和他一样对此是很焦虑的。我们都曾看到，很多作家随着自己的身份变化，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甚至精神立场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很令人吃惊的，说得严重点，是发生了背叛。年初我在和诗人王家新的一次对话中，曾经谈到过知识分子精神背叛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背叛是和他们的身份归属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新变中，社会转型的急剧深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在很多作家那里激发和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品格，这就是介入意识的自觉，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家也开始自觉地介入社会，承担起文学应有的使命，我们在很多作家、很多诗人的文学实践和很多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中，都能看到介入的自觉。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起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惟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我们且不问是惟有诗歌还是其他文体更加能够应付现实，这里我关心的，是他所提出的文学关注或者是介入现实的方法，即是“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所以我也同意，文学对现实的介入绝对不能局限于对具体问题的揭示，更加不能停留于现实的表面，而是应该透过这些，按照诗人多多所说的，要“直取事物的核心”，进入本质。在今天这样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具有这样的自觉，或者说，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在此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那它的合法性，它所存在的理由，真的会遭到质疑。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自觉和有效的社会介入，来重建、挽救或者是增强文学的合法性。

介入的限度与美学的困境

前面我说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的介入虽然具有一定的自觉，但却是非常有限和不充分的。一方面，中国作家对于社会的观察缺少应有的全面性，很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被文学所有意无意地省略，这也许与目前仍然存在的文学的制度限禁很有关系，但是作家自身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以为他们面对现实时的犬儒主义的逃避，就很迫切地需要正视；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缺少应有的深刻，即使是那些自觉地进行社会批判的写作，所征用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资源——比如左翼的资源和人道主义的资源——往往也是非常简单、匆忙和未经反省的，这都使得社会批判与社会介入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限度。

是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思想能力和价值立场方面，这两方面的薄弱可能是我们的文学在社会介入时缺乏力量和存在着限度的主要原因。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揭示确实也有一定的自觉，比如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官场腐败问题和生态问题等，很多作品都有反映。在这些方面，甚至产生过不少在一段时期广有影响的重要作品。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其中的很多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揭示，由于只是简单征用左翼资源或人道主义资源等等，很难应对复杂的中国现实。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价值与思想方面的深刻创造。不过，我们讨论介入的限度，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书写还是有所顾忌和有所选择的。记得台湾的文学批评家吕正惠在反思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曾敏锐地指出过，即使是那些在当时挑战现代主义的回避现实、突出强调“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的以陈映真等人为代表的台湾乡土小说家，对于社会的书写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选择性，比如当时在实际上已经启动的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反映得就不是很充分，而这些运动对台湾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这也就是说，就对社会书写的深度、广度，特别是在对社会核心问题的充分揭示方面，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乡土小说其实是有失职的。我们似乎也应该追问一下，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书写，是否也有失职的地方？

但我认为，在社会的核心问题上，我们的文学绝对不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啊！社会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要害与本质，很多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都很深刻地牵涉到它。如果作家对社会的介入未曾触及甚至刻意回避这个要害与本质，那他的介入便会出现巨大的限度。陈映真也是我很钦佩的台湾作家，但他这些年来的很多观点与主张，我以为是很

成问题的，我对他也非常失望，我想这与当时以他为首的台湾乡土小说家所存在的介入的限度很有关系。对于当时台湾社会最为核心的问题，其实陈映真们并没有自觉，也没有能够充分地书写。陈映真现在的思想误区，其实能够从当年的限度找到原因，我们应该引以为鉴。还是来具体地说这十年的文学吧。在社会书写的选择性忽视方面，意识形态与文学制度的题材禁区与话语禁忌显然是存在的，这一点我们无可避讳，其实也不用做过多的讨论。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在被允许的社会批判中，文学写作仍然存在着很不到位的情况。比如在所谓的“底层写作”中，这一状况就很突出。“底层写作”应该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最为强劲文学思潮，特别是在对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自觉书写方面，影响很大，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的介入意识也很自觉。但我以为，这些作品对社会的介入，力量其实非常有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所赖以介入的精神立场与话语资源存在着问题。他们所运用的，主要就是人道主义和左翼的资源，典型的比如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鬼子、胡学文、罗伟章和王祥夫人的小说，另外像贾平凹的《高兴》、张炜的《刺猬歌》、李锐的《太平风物》及迟子建的一些小说，还有像杨键、雷平阳、田禾、江一郎、辰水、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王夫刚、谢湘南和郑小琼等人的很多诗歌，这些作品在诉诸的人道情感并且唤起我们“正义的愤怒”的同时，并未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人道主义无疑是永恒的，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审视我们的社会与生存的价值基准，但是我们忽略了，人道主义其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绝不仅包括情感，它还应该有权利方面的诉求，而在很多“底层写作”中，人道主义往往只诉诸情感。

其实“美学的困境”非常之多。另外，比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我们的文学似乎还未提供一个足以“传世”的人物形象吧？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实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国民的精神、命运与生存，文学进行社会

介入的独特性与它的力量，还应该体现在美学上，尤其应该体现在作为美学成就之重要方面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上，这个方面，我们的文学似乎还有很大的问题。

精神的减损与耗散

文学介入的限度除了如上所述的种种原因外，我以为与我们的文学中所存在的精神减损与精神耗散机制很有关系，这样的机制很像是弹簧，或者是海绵，再怎样有力的重拳打在上面，也会变得绵软无力，难得要领。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与合适，但我以为，像目前的文学体制新的一体化企图与实践，作家群体的内部分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谋与同构，文化环境的杂乱、平庸与恶劣，文学大众的蒙昧，等等，都是这一机制的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本来已经问题重重的介入更加乏力。

“精神的减损和耗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处境，我们都应该感受到。比如我们学院中的知识分子，在迎合科研管理方面的种种要求时，这种体会是很深刻的。勘破这一机制，是我们知识分子精神重振的重要前提。清华说到作家们的思想问题，现在不仅是作家，就是那些专门地过着思想生活的理论界人士，还有我们的批评家们，思想困惑与价值困惑都很明显，如果一定要在“新左”与“自由主义”间站队，很多人都是左、右为难，有的干脆变成了简单的民族主义者。我们的文学在进行社会介入时，这些思想与价值上的困惑，也就是清华说的“干扰”，无疑会造成精神的减损。很难指望一个在基本的价值立场方面游移不定作家能够做出怎样有力的介入。在价值立场方面，文学应有基本的坚定与果决，但这种立场如何确立，恐怕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成员，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维护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中国的

经济崛起，世界范围内在民族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有的也很尖锐与激烈，但我们对世界事务与民族国家事务的忧心与关切，千万不要将民族国家抽象化与本质化，陷入一种形而上学，变成一个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者。我们不仅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注意到差异与冲突的存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冲突与矛盾，对于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来说，可能更加直接与具体，也会更加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与生存，因此我以为，不管我们有怎样的困惑，共同体中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与幸福，无疑应该是我们最基本的立场。一九七〇年代，台湾的社会转型也正面临着与美国、日本等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面对当时知识界与文学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思想困局，胡秋原先生就曾指出，我们在外面不能受别人的欺负，在家里也不能欺负自己人，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记住。

你提到了这些年来文学的内部在不断地“分裂、妥协、修正和整合”，我想多说说文学的外部。二十一世纪以来，文学体制日益体现出愈加迫切的一体化企图，这一点我们都能体会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分为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年代的一体化时期和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的“去一体化”时期，在“去一体化”实践并未获得真正成功的今天，新一轮的一体化又在进行。我不知道二位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但我以为，正是在这种新的一体化实践中，中国作家的精神遭到了非常有效的耗散与减损，至于隐藏在其中的精神耗散与精神减损机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评奖制度。现在我们的国力强盛了，对于文学体制的财政投入力度很大，作家们获得诸如“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之类政府奖的利益非常诱人，而我们知道，这些奖项的评选在话语表达与精神立场方面是有标准的，这就很必然地导致了那些企羡获奖的作家们对社会的批判与介入顾虑重重，在个人良知与获得奖项之间寻找平衡，我想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很深知诸如此类的“平衡术”，而这种“平衡术”，正是减损与耗散中国文学和中国知

识分子介入精神的重要机制。

清华说到了“利益”，这真是研究当下中国的文学与知识分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词”。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很廉价的，一些在商人眼中不值一提的金钱，在官员眼中不屑一顾的“职位”，都会使他们趋之若鹜地违背“初衷”、放弃操守与原则，改奉新的神明与价值。有些早年的作品非常激进的作家，现在的很多言谈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就差点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人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在当前的社会里活得是那样的滋润与惬意，舒服无比，因此脑袋也就会发昏，会蜕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其实算起来，所得到的利益又有几何？我们真的应该为他们可惜。

二位都对一体化的成功与可能抱有怀疑，但我们一样，都对目前一体化的努力看得很清楚，也觉察到它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完全会使他放弃对社会的介入与批判。文学的精神力量，很容易在利诱与怀柔中不断被减损，变得软弱与昏昧。这些年来，文学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不断地招兵买马，不断地扩容与收编，先是叛逆小子“八〇后”，现在又是网络作家，甚至是那些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作家的网络写手，以及那些形形色色曾经很“酷”、很“顽劣”、很有锋芒的“文学的异见人士”，都被纳入体制，这既显示出体制的包容性与一定的弹性空间，也很充分地说明了其一体化的雄心壮志，但也正如二位所说的，壮心不已的一体化努力究竟能否成功，实在是可疑的。不过有一点还是要指出，就是一体化的扩容不管怎样广泛，还是有边界与底线的，而这边界与底线，可能正是我们介入的限度之所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无疑要高度警觉。今天的社会异常复杂，我们的文学要重获伟力，介入的清醒与高度自觉，以及对种种操控和损毁性力量的反抗，非常必要。

繁盛时代的精神衰变

——“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之二^①

九九三年，也是在《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王——
晓明教授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曾经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引发过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讨论，对此，我们应该都记忆犹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这里，基本上还是就我们的文学实践来讨论精神问题，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也让我们感慨万端。时隔多年，我们很自然地要问，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年漫长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与文学文化实践，“旷野上的废墟”是否已不再？与当年的“旷野”相比，我们目前所置身与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号称“崛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的社会 and 我们的文学，又各是一幅怎样的精神景象？我想，这个问题一旦去作认真的思考，悲从中来，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的感受。这么多年，说实话，与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希望相比，无论是我们的民族与社会，

^① 参加本期讨论的另有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和辽宁师范大学张学昕教授。

还是我们的文学，精神成就都有限。

精神现实与文学的承担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繁盛”的时代，经济“繁盛”，文学也“繁盛”。这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经济的繁盛使得我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遍呼“崛起”。到了今天，晚清以降的“强国梦”似已成真，贫弱多年的中国终于出现了强大的迹象，表现在精神上，当然也相应地产生了豪迈、自信与不无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另外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令人担忧甚至是很可怕的现象。比如前不久，《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时评，痛苦反省诸如矿难、火灾、血拆、石化爆炸和工业污染之类的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发展。其实这也警告我们，一路狂奔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很严重的灾难与问题，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如果连对人的生命都不再珍视、不再疼惜，再多的财富、再大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又认为，在我们的经济成就与精神成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我们可能就像一个“暴发户”，腰缠万贯，精神上却很苍白、贫穷，甚至很粗鄙与野蛮。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的层面上，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现实。想想看，如果一个社会伤天害理的事情大面积地屡屡发生，频频出现诸如毒奶粉、地沟油和制卖假药等直接危害生命的药品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那这个社会 and 这个民族的精神到底衰变到哪一个地步，真是可以想见的了。我想这起码说明，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利益与物欲的诱惑与驱动下，精神的制约往往已失效，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无限膨胀或充斥着的，往往只是利益与欲望。“掘金时代”的上空飘扬的是“欲望的旗帜”，精神却处于灰败与危机之中。面临如此严峻的精神现实，我一